

薛暮桥文集

第二十卷

薛暮桥文集

第二十卷

(1996)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第二十卷

薛暮桥回忆录	
(1996 年)	1
薛暮桥主要著述目录	341
薛暮桥年谱	345

薛暮桥回忆录^{*}

(1996 年)

^{*} 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7 月出版第一版、2006 年 1 月出版第二版。此次重排采用的是 2006 年 1 月版本，删去了“附录”和“再版附文”。——编者注

1996 年版代序言^{*}

同志们、朋友们：

很感谢大家光临，特别要感谢朱镕基同志光临。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看到了几年没有见面的领导同志、老同志、老朋友，心里很高兴。各位都是忙人，我是闲人，忙人来祝贺我这个闲人，真是愧不敢当。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80 年代我身体还健康，精力充沛，能够东奔西走，调查研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写文章、作报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做一点贡献。虽然忙忙碌碌，心里却非常高兴。由于经常参加活动，能够有机会和许多老同志、老朋友见面，谈笑言欢。

进入 90 年代，1991 年春，我患了“帕金森”病，中枢神经部分病变，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清，嘴巴也说不清楚。稍一疲劳就头晕脑胀、焦躁不安。三年多来不能够工作，不能参加任何会议，看报纸、文件都由秘书念。我看到我们国家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形势很好，改革力度加大，进展健康，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此，我特别感到高兴。我的身体，最近一年多有些好转，能够参加一些小规模的社会活动。我现在仍坚持锻炼，争取健康更加好转，能继续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今天这个座谈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委组织安排的。参加的都是我很想会见的老同志、老朋友，一下子能有幸会见许多渴望已

^{*} 这是作者 1994 年 10 月 25 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久的同志们，我心里非常高兴，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本来想同各位到会的同志们一一握手问好，怎奈力不从心，只能坐在这里向各位拱拱手、问问好，并表示我衷心的感谢（拱手向大家致意）。在这里，我要特别对组织和安排这次座谈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能再多讲了，谢谢各位。

薛暮桥

1994年10月25日

敬爱的薛暮桥同志：

从1955年开始，我曾有几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几十年来，您对我的教诲恩深义重，受益终生。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今后仍然是我的老师。我要学习您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献身精神；学习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相结合的优良学风；学习您在理论上不断开拓进取、永无止境的革新气魄；学习您公正无私、宽容大度、广泛团结各方的高尚品质。

60年来，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做了别人无法做出的贡献。人民会感谢您。敬祝您健康长寿。

学生 苏星

1994年10月22日

向薛老致以我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薛老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他对我国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指点和帮助下，成长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薛老治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在实践中形成、修正和发展他的理论观点，因而能够始终扣紧时代的脉搏，不断做出新贡献。我认为，我们祝贺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就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不懈地探索真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我们国家的现代

化建设事业添砖添瓦。祝贺薛老健康长寿！

后学 刘国光

1994年10月25日

敬爱的薛老：

自从1959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经济研究所临时分配我当您的助手以来，36年已经过去了。在和您的接触中，特别是1984年以后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我的最大感受，是您的那种超乎寻常的严肃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您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永远学习的。

吴敬琏

1994年10月24日于斯坦福

2005 年版序言

吴敬琏

《薛暮桥回忆录》是1996年7月出版的。当时，北京经济学界曾经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虽然薛老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遗产永存。天津人民出版社积极筹划，再版这本回忆录，我认为是很意义的。

我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括“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终至成长为30年代中国左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工作，而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共和国经济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第三个段落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这一改革的一位重要设计师和推动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他始终秉持着极其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唯其有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不但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从经验总结中提高，在理论上升华。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左翼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当时提出的论点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不全都无可挑剔，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整整一代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理论联系实际

好学风帮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转换，成长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理专家。这使他能够在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参与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战役。然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不去的忧思。

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然而，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讲述过他在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认真思考“十七年”^①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代，我和我的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宣布要向自己的“老弟”（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说到做到。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例如，他在70年代后期就不顾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高速度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情况，犯颜极谏，批评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方针。他曾是中国“三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述人，然而当他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偏颇，便勇敢地指出片面追求所有制的“纯而又纯”和“单一”乃是一种失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正途。他曾在60年代初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坚持，

^① 指1949年至1966年。——原编者注

不改初衷。

在最后三十年的岁月中，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定，而且由于对经济实务极为熟悉，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我国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上的得力参谋和帮手。比如，80年代中期的财政、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组织实施的。

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broner）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称做“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朽功勋。

薛老在2005年7月22日走完了他101年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消息传来，我正在上海授课。从1959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1984年8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事报到，开始在中心二十年的工作，再到他去世前十多天到北京医院对他作最后的告别，回首这四十六年的前尘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薛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2005年7月

目 录

一、献身革命事业	12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2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	16
“牢监大学”	23
迎接新的斗争	31
二、在白区思想文化战线	35
开始经济研究生涯	35
到广西师专教书	40
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和文救会的活动	46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52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的群体	67
将《中国农村》迁往内地	80
三、投笔从军	88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	88
撤离皖南到苏北	98
回顾皖南事变前后	104
在华中抗大五分校	107
在抗大华中总分校	111
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实践	122
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	122
对敌货币斗争和工商管理	128
到华北财经办事处	136

在中财部和中财委	146
五、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	156
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156
对社会主义改造认识的逐步深化	164
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作	178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	187
六、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国民经济	195
对“大跃进”的异议	195
参加政治经济学读书会	201
参与起草和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203
参加落实经济调整的几次重要会议	208
在全国物价委员会及参加“四清”运动	214
七、在十年内乱中	225
被批斗审查	225
在五七干校	230
曲折中得解放	234
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240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	240
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246
出访美国、香港	255
九、1979 年至 1984 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	
改革的探索（上）	260
关于调整的争议	260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265
十、1979 年至 1984 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	
改革的探索（下）	275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275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277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	286
十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301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301
宏观失控和通货膨胀	306
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	312
从曲折中吸取教训	318
十二、在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323
关于改革目标的新的争论	323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建议	326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	32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333
1996 年版后记	339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父亲为我起名薛與龄。无锡县位于中国江苏省南部，南濒太湖，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初的无锡，已有几家纱厂、面粉厂和丝厂，到了20年代工厂已近百家，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历来有“小上海”之称。像礼社这样一个小镇，也在1923年办了一个小发电厂，除照明外，还用于水利灌溉和轧米。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谓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但无锡在那个时候已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之说。

薛姓是无锡西北乡大族。远在明代末年，薛姓的祖先是一个将军，因获罪贬谪到无锡礼社，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他有五个儿子，二十五个孙子，形成一个地主集团。薛姓家族为五房，第五房的祖上用1350亩旱涝保收良田设立了一所“义庄”，供养后代中不能自己谋生的子孙。“义庄”规定，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16岁者，每年每人可分2石（300斤）米，16岁以下分一石米；婚丧大事均有资助，此外还补贴学费，救济孤儿寡妇。祖先设立“义庄”的目的，是希望后代能过稳定的生活，永传香火。但薛家的许多子孙由于有“义庄”作为生活保障，便不但不愿务农，而且不愿出外做工、经商，待在家里打麻将，抽大烟，游手好闲，后来吃“义庄”的人越来越多。到我出生时，礼社薛家地主集团已趋于衰败。一些吃“义庄”的人开始靠借债典当度日。祖先为后代谋福利而设的“义庄”，最终加速了家族的没落，直到现在它的消极后果仍未完全消除。可见生存的权利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坐吃山空是没有出路的。我的父亲爱面子，家境最困难时也并未吃“义庄”。当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但发生在身边的这一严

峻社会现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我注意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起始点。我在1932年写了一篇题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文章，详尽地分析了礼社的经济状况和变迁。文中在分析薛姓家族没落时指出：“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①

我的父亲薛魁标是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为人和善、厚道，从不打骂孩子，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他少年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一家烟店，加工、出售土烟丝。从家产看，我家在当地算是小地主兼小商人。薛魁标15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已经去世，由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当家，造了一所有三间四进的住宅，把田地卖了一大半，家庭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当时全家有三房，薛魁标是长房，共生子女六人，三男三女；二房夫妻早丧，留下两个儿子；小房也有两个儿子，这四个都是我的堂兄。小叔平庸无能，在烟店当个普通的店员。这一个庞大的家庭，都靠我的父亲支撑，小辈长大要进中学、大学，开支很大。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的父亲还想干一番事业。

薛姓祖先除办“义庄”外，还办了一所义塾（后称群智小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在我幼年时，由我父亲出钱，利用家中的大厅，办了一所“培本女塾”，为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办女塾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是不合封建传统观念之举，但我的父亲办这所女塾在礼社受到乡民的欢迎。无锡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和礼社地主集团的破产，使封建思想随之削弱，开明与进步的思想相应来得早些。许多地主和乡民纷纷把女儿送来上学。“培本”为培养根本之意。女塾办起来后，聘请了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亲自讲课。我6岁时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是女塾，因此同学都是姐姐，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成了全班的小弟弟。按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三块钱学费。但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交费，我的父亲也不好意思催要。虽然赔钱很多，父亲还是坚持办学。记得每天最后一课是母亲主持的，她要我们背书，我背了“天

^① 原载《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出版。